



日本近现代史

第二卷

〔日〕今井清一 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近现代史

第二卷

〔日〕今井清一 著

杨孝臣、郎唯成、杨树人 译

邹有恒 校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日本近代史 II
今井清一 著
据岩波书店 1977 年 12 月版译出

日本近现代史

第二卷

〔日〕今井清一著
杨孝臣、郎唯成、杨树人译
邹有恒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16

1983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86千
印数10,100册 印张 7 7/8

定价：1.00 元

JP87
3/3

目 录

序言	1
序论 日俄战争的意义	3
第一章 桂、园时代和战后经营	9
第一节 朴茨茅斯条约和日本	9
日比谷骚动事件	9
变韩国为保护国	12
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	13
第二节 西园寺内阁和军部	16
西园寺内阁的组成	16
关东都督府和满铁的设立	18
帝国国防方针和军令	21
积极政策和废税减税运动	23
足尾暴动与赤旗事件	26
第三节 “满洲”问题和吞并韩国	31
日法协约和日俄协约	31
第三次日韩协约和义兵斗争	33
围绕“满洲”权益的斗争	35
吞并韩国	38
第四节 第二届桂内阁和大逆事件	40
政府、政党、财界	40
农村和地方改良运动	46
“大逆事件”	50
第二章 大正政变前后	54
第一节 从明治到大正	54

“情投意合”与第二届西园寺内阁	54
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56
改元前后	60
第二节 大正政变和护宪运动	64
增师问题和陆军的倒阁	64
护宪运动	66
山本内阁的各种改革	72
第三节 护宪运动的瓦解	75
政界的变动和中国二次革命	75
西门子事件	77
大隈内阁的组成	80
第四节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8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83
日本的参战和占领胶州湾	84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86
一九一五年大选	88
第三章 第一次大战中的日本	92
第一节 从大隈内阁到寺内内阁	92
大战景气和工业发展	92
日俄同盟和排斥袁世凯运动	95
寺内内阁和外交调查会	98
第二节 西原借款和出兵西伯利亚	101
大战的扩大	101
援段政策	103
俄国革命和日中军事协定	106
西伯利亚武装干涉	109
第三节 民本主义和米骚动	111
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111
大战景气下的政府和民众	114

米骚动	119
原内阁的组成	122
第四节 巴黎和会和亚洲	125
巴黎和平会议	125
朝鲜三·一运动	128
中国五·四运动	130
知识分子的对策	132
第四章 民主运动的开展	135
第一节 原内阁和普选运动	135
积极政策和民众运动	135
原内阁的对策	137
大选和两院纵断	140
原内阁的末期	142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和西伯利亚撤兵	146
大战后的中国和日本	146
西伯利亚的战败	149
华盛顿会议	150
西伯利亚撤兵和援助张作霖	153
第三节 工农运动和政府的对策	157
神户工潮	157
日本农民组合和全国水平社	160
改组统治体制的活动	164
过激法案和日本共产党	168
第四节 关东大地震	171
反对过激法案运动和检举共产党	171
关东大地震	174
屠杀朝鲜人的事件和治安维持令	176
虎门事件和反动势力的发展	178

第五章 政党内阁及其动摇	182
第一节 “宪政的常道”	182
第二次护宪运动	182
整顿行政财政和宇垣裁军	184
普选和治安维持法	187
三党鼎立	190
第二节 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和工农斗争	194
币原外交和中国的动荡	194
垄断资本的发展和二重结构	199
无产阶级政党和工农运动	202
第三节 田中政友会内阁	207
三党首脑会谈和金融危机	207
第一次普选和三·一五检举	210
炸死张作霖事件和田中内阁的瓦解	215
第四节 在经济危机的旋涡中	218
滨口内阁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	218
伦敦条约问题	220
经济危机和日本	223
“满蒙”问题和三月事件	226
人名索引	231
事件索引	236

序　　言

本书作为《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叙述了从日俄战争起到九·一八事变前夜四分之一世纪有余的历史，上承远山茂树著的《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下接藤原彰著的《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

在此时期，日本迅速完成了帝国主义的发展，在国民生活方面虽还落后，但已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日本利用二十世纪初期国际间的对立，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逐步蚕食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就乘此良机向东亚扩张势力。日本成了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使它在亚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中陷于孤立，并竟然同它为敌了。另外，这一时期又是处于广义的大正民主政治时代，以反对专制政治、确立人权和获得政治自由为目标，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群众运动。但这个运动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出现了种种偏差。

1917年俄国革命和第二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帝国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东亚，也以日本的“米骚动”、朝鲜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为开端，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由于米骚动的冲击，日本也建立起正式的政党内阁，但由于面临根本上摇撼帝国主义的这种动向，便加强了走向反动的倾向。民主政治运动，一方面对这种解放运动表示共鸣，有时进行协助，但真正面临这种情况时，帝国主义体制下的人民群众如何应付它，却是个严重的考验。

本卷以政治、外交领域为重点，力求对这个时代进行综合的叙述。这时总想弄清楚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构，尤其是它的具体组

织。对个别事件往往叙述过细，其目的就在于此。在考虑当前的日本问题时，联想到的事也的确不少。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以前有些先驱的成果，但整个来看，在战后相当时间里处于空白阶段。直到最近，才把研究中心放在民主运动和人民群众的动向上，盛行起来，成果也多了起来。在这种研究进展的鼓舞下，才写出了这本书。但未能总结之处还不少，由于这个时期的研究涉及到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社会运动等各个领域，尽量把所有重要的研究和史料注释出来。

本卷没能如期写完，第一卷出版后拖了这么久，真对不起各位读者。在这期间，岩波书店诸位给予多方面帮助，谨表谢意。

今井清一

1977年11月

序论 日俄战争的意义

1904到1905(明治37到38)年的日俄战争，对于世界不久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对于日本为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而急欲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动向，都是一个划时代阶段。

日本和俄国围绕着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统治权进行了战争，包括这个地区在内的整个东亚，当时曾是国际政治的焦点。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急剧活跃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掠夺殖民地的竞争，甲午战争以后在东亚激化了。因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时，俄、法、德三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归还给中国，还向在中国拥有强大势力的英国进行挑战，展开了提供借款、攫取铁路权益和租借地的竞争。美国也在美西战争中夺取了菲律宾，要求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事件一发生，日本便借口英国要求进行出兵，使列强承认了“远东宪兵”的作用。这个事件以后，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日本便和害怕俄国南下的英国结成日英同盟，接着因要求俄国撤兵，发生了日俄战争。在日本的背后，站着英国和要求中国门户开放的美国；在俄国方面，有结成俄法同盟的法国和期待俄国东进的德国。

欧洲最大的陆军国和亚洲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日俄战争，是普法战争以来的一次正规战争。两国把总计二百万人的大军派到“满洲”，用精锐的武器，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战争达十九个月，演成了消耗战。两国都加强了战争动员，由于所付牺牲和负担过重，使两国的政治、社会受到很大冲击。两国在军需和资金方

面分别得到了列强的支援，战争的进行和结束受到这些列强的约束。战争高潮一过，早就警惕日本强大的美国，希望由俄国来牵制日本。在加利福尼亚州，掀起了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

这次东亚的战争，既是掠夺殖民地战争的一个回合的终结，又是准备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用掠夺东亚殖民地来摆脱其内政外交僵局的阶段已告结束。于是以英国和急剧抬头的德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的对立为核心，列强正在为重新瓜分世界进行决战而赶紧结成战线。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立的焦点便转移到欧洲及其周围。

1905年初，俄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革命形势扩大，使它决心走向媾和。这次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工人、农民为了打倒专制和拥护劳动人民的权利而发动的群众斗争，创造了帝国主义阶段革命的新型式。这次革命以边境巴库石油工人总罢工为先导，并和被压迫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

不过，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左右着世界大局，制造民族分裂。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侵略过程中，爆发了反对这种侵略的民族运动。但是这种民族运动，不是被歪曲到借助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来谋求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方向上，就是个自陷于孤立。^①遭受不平等条约折磨的日本，选择了自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来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道路。正象在日俄战争中的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国际大会上，代表交战国的片山潜和普列汉诺夫在讲坛上握手受到欢呼那样，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认识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战运动的重要性。但在这一点上还有很多不彻底方面，尤其殖民地问题是它的弱点。

日俄战争当时的内阁，是以山县系官僚为中心的第一届桂太郎内阁。以萨长出身的元老为首的藩阀官僚，在徒有其表的立宪制度下掌握政权机构，长期垄断着政权。桂是陆军大将，又是陆军

长州阀的直系，他的内阁是元老的下一代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元老不仅承担推荐继任内阁首相、参与御前会议等重要会议的策划，而当日俄一开战，还公开出面活动。参谋总长大山岩出任满洲军总司令官后，由山县有朋继任。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当上天皇的顾问，还以大使身分出使朝鲜。松方正义和井上馨奉旨协助战时财政。

在日俄战争前，继伊藤博文之后，西园寺公望任第二代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和以大隈重信为总理的宪政本党联合对抗桂内阁。日俄战争爆发后，需要政党合作，桂内阁便召开官民恳谈会，政党便借此参与战时和战后的经营，加强了在统治体制中的发言权。^②在提出第二次增税案的第二十一届议会上，桂首相表示战后愿把政权让给西园寺，要求政友会合作，和政友会的实力派原敬定下了合作密约。^③于是政友会和宪政本党联合对抗桂内阁的对立关系为之一变，产生了桂内阁和政友会以轮流执政为设想而进行合作的桂、园时代的模式。

日俄战争中，日军动员的兵力，仅陆军就约有一百零九万人，九十四万余人开赴战场。其中阵亡和病死者超过八万人，伤者达十三万人。^④日本的战费达十七亿一千余万日元，超过战前1903年岁入总额的六倍半。

为了获得战费，曾两次新设包括扩充专卖事业在内的非常特别税，其增收额在1904到1905两个年度就达到了二亿一千万日元。而1903年的租税和专卖收入为一亿六千一百万日元，增税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了。税额增加最多的是地税，其次就是专卖收入、砂糖消费税等间接税。而且作为增收地税的报偿，新设了有利于地主的粮食进口税。增税的负担，都落到了农民、小市民和工人等群众的肩上了。

公债是筹措战费的主要来源，其发行总额达十四亿七千余万

日元。其中八亿日元是外债，在伦敦和纽约发行，第二次以后也在柏林发行了。战争之后不久还另外募集了二亿四千余万日元的外债，为支付公债本利的公债费，从1903年的三千余万日元激增到1906年的一亿五千余万日元，都成为了国民的负担。

日本是怀着和大国俄国面临战争的危机感而起来对抗的。报纸杂志都起而煽动国民的危机感，鼓吹斗志。通过在辽阳和旅顺的苦战而取得的胜利，激发了群众的民族主义。政府通过地方行政组织加紧国民动员，推动了纳税、募集公债、支援军人以及改良农业等措施，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为此服务的地方组织。

在日俄战争以前，普选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反对足尾矿毒运动等以人权和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在彼此呼应中，开始扩大到人民群众之间。但是，在战争前后的民族主义高涨中，这些运动被割裂了。这些运动的领导人新闻记者和律师等青年议员，大都走向了开战论。幸德秋水、堺利彦等平民社系的社会主义者公然打起了反战论的旗帜，但在严酷的镇压下不得不陷于孤立境地。然而，转向开战论的这些政治家们也没有停止对桂内阁的专制政治和压制言论的批判。战争的牺牲和负担完全落在人民群众身上，他们的不满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却采取了一种曲折的形式，即从对外强硬立场被动员起来攻击政府。

对俄国大国的胜利，在军人以及广泛的国民中间，产生了作为亚洲强国的自负和骄傲，但在另一方面，也把国民从长期的国家危机感中解放了出来。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竞争，急于建立扩充军备、开发殖民地、充实产业基础等帝国主义体制。这就是所谓战后经营。然而这些事业已超越了日本的国力，致使它一方面对亚洲各国进行压迫和掠夺，同时，又不得不依靠欧美列强。同和国家结合起来的大资本的发展相反，由于重税和物价高涨造成的生活困难，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起来。深感危机的统治阶层，力图加强

由天皇制和家族制度所代表的强权的高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而另方面，不顾国家而注视个人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动向，却在以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为中心开始扩展起来。

① 江口朴郎《帝国主义的时代》，1969年，94—96页。

② 那须宏《帝国主义形成期的天皇制》，1974年，449页。

③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1950—51年，明治38年12月8日项下。

④ 大江志乃夫《日俄战争之军事史的研究》，1977年，129—130、171页。据沼田多稼藏《日俄陆战新史》（1940年）载，“我方损失，死约八万四千四百人，伤约十四万三千人”（225页）。

第一章 桂、园时代和战后经营

第一节 朴茨茅斯条约和日本

日比谷骚动事件

1905年春，日本虽然继奉天会战之后又获得了日本海海战的胜利，但无论在兵力或财政方面，都不能把战争再继续下去了。而沙皇俄国也因为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动荡，被迫想早日媾和。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从中调停，8月间，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召开了媾和会议。当会议陷入僵局之后，日本撤回了提出的赔款要求，在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 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
- (二) 俄国在旅顺口、大连一带的租借权以及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间的铁路及其所属权益在清政府承认的条件下，让与日本；
- (三) 日俄两国军队除上述租借地以外，从满洲同时撤兵；
- (四) 俄国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让与日本，准许日本国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沿岸享有捕鱼权。

不过，这个条约的内容，与日本国民所期待的过高要求相差很远，特别是没有获得赔款，而巨额的战费全由本国负担，这就激起了国民的失望和愤怒。

在签订条约的9月5日发生了日比谷骚动事件，骚动扩展到东京全市。当天政府下令禁止预定在日比谷公园召开的反对媾和条约的国民大会，封锁了公园，而聚集的民众则以东京市参事会员

为先锋，排除警察的阻挠开起大会。由于警察的镇压而被激怒的民众，会后袭击了内务大臣的官邸、政府系的国民新闻社，政府立即出动军队，于是民众就焚烧和捣毁了各处的警察署和派出所。第二天骚动仍然继续，民众焚烧了电车和教堂。

警察进行了极端狂暴的镇压，当内务大臣官邸受到攻击时，警察拔出刀来扑向群众，当场死伤了好多人。^①桂内阁于6日夜间对东京市及东京府内五郡发布戒严令，企图用军事力量进行镇压。既不是战争又不是内乱，却实行戒严，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②政府还进而颁布了准许内务大臣得以停止报纸发行的紧急敕令来压制言论。但是，由于桂内阁违反宪法施行镇压，反对媾和运动便和抗议政府活动结合起来，扩展到了全国。

这次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排外主义、扩张主义的性质。但同时也是由于民众因战争被迫遭受重大牺牲和艰苦生活的强烈不满而爆发的，所以也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反政府运动的性质。暴动的主要力量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陷于分化过程的手艺人，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被迫过着极其不稳定生活的日工、人力车夫等城市各种职业阶层，是这个时期流入和呆在城市的贫苦无产者阶层^③。他们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独揽政权、极端横暴、压制民众的言论、集会自由的藩阀专制统治。

继日比谷骚动事件之后，反对媾和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反对媾和条约的县民、市民、郡民、町民大会几乎遍及全国。报社和新闻记者集团以及政党有志之士、律师、中小工商业者是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运动发展过程中突出了对藩阀专制的批判，因此，黑龙会等不批判藩阀专制的对外强硬派便脱离了运动。^④

如果把东京日比谷骚动事件和扩展到全国的反对媾和运动结合起来看，这里已经明确地出现了后来城市群众运动的雏形。这些领导人大都继承了日俄战争前的社会运动的传统，他们重视过去